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第二輯

張伯偉 主編

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

張伯偉 著

中華書局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第二輯

張伯偉 主編

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

張伯偉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張伯偉著.-北京:中華書局,2011.9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第2輯)

ISBN 978-7-101-08140-4

I. 作… II. 張… III. 文化史-東亞-文集

IV. K310.0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70649 號

-
- | | |
|------|---|
| 書名 | 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 |
| 著者 | 張伯偉 |
| 叢書名 |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第二輯)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
| 版次 |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14 插頁 2 字數 340 千字 |
| 印數 | 1-15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978-7-101-08140-4 |
| 定價 | 39.00 元 |
-

總 序

張伯偉

十六世紀以來，在一些西方的文獻中，往往提到中國人有這樣的自負：他們認為惟獨自己纔有兩隻眼睛，歐洲人則只有一隻眼睛。這些記載出自英國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國的伏爾泰也曾謙遜地認同這種說法：“他們有兩隻眼，而我們只有一隻眼。”用兩隻眼睛觀察事物，是既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為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仁”，本來就是著眼於自我和他者，本來就是在“二人”間展開的。不過，當大漢帝國雄峙於東方的時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謂的“仁政”，實際上所成就的卻不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圖像。政治上的冊封，貿易上的朝貢，軍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過這樣的過濾網，兩隻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過是自己在他人身上的投影。這與用一隻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呢？

從十三世紀開始，陸續有歐洲人來到東方，來到中國，並且記錄下他們的觀察和印象。於是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逐漸有了一個不同於自身的他者，也逐漸獲得了第二隻眼睛，用以觀察周邊和遠方。不僅如此，他們還讓中國人擦亮了第二隻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漸漸認識了自己。不過，這是在中國人經歷了近代歷史血和淚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後的事情。

同樣是承認中國人有兩隻眼，但在德國人萊布尼茨看來，他們還缺少歐洲人的“一隻眼”，即用以認識非物質存在並建立精密科學的“隻眼”。推而廣之，在美國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及周邊各地區人的觀察中，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中國，也必然是色彩各異、修短不齊的形象。我們是還缺少“一隻眼”，這就是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正如一些國外的中國學家，曾把他們觀察中國的目光稱作“異域之眼”，而“異域之眼”常常也就是“獨具隻眼”。

然而就“異域之眼”對中國的觀察而言，其時間最久、方面最廣、透視最細、價值最高的，當首推我們的近鄰，也就是在中國周邊所形成的漢文化圈地區。其觀察記錄，除了專門以“朝天”、“燕行”、“北行”及“入唐”、“入宋”、“入明”的記、錄為題者外，現存於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漢籍，展現的便是“異域之眼”中的中華世界。這批域外漢籍對中國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呼應，對中國古籍所提出的問題，或照著講，或接著講，或對著講。從公元八世紀以降，構成了一幅不間斷而又多變幻的歷史圖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經濟、思想、宗教、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醫藥、民間信仰和習俗等各個方面，系統而且深入。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域外漢籍不僅推開了中國學術的新視野，而且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新材料”，從一個方面使中國學術在觀念上和資源上都面臨古典學的重建問題。重建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更

好地認識中國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新貌之獲得,有賴於當時的新材料和新觀念,用陳寅恪先生的著名概括,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域外漢籍可大致歸入“異族之故書”的範圍,但其在今日的價值和意義,已不止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於“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為中國文化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所以,域外漢籍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成為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正是本著這一構想,我們編纂了“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其宗旨一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向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總之,我們期待著從“新材料”出發,在不同方面和層面上對漢文化整體的意義作出“新發明”。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宋儒曾把這兩句詩看作“浩然之氣”的形容;“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唐代鑒真和尚曾因這四句偈而東渡弘法。我願引以為域外漢籍研究前景和意義的寫照:它是四方仁者的“同天”,是穿越了種種分際的交匯,是智慧的“結緣”和“對語”,因此,它也必然是“生香不斷”的光明事業。

是為序。

目 次

導言：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	1
--------------------	---

東亞文化意象的形成與變遷

——以文學與繪畫中的騎驢與騎牛為例	11
一、引言	11
二、騎驢意象在中國的起源與嬗變	13
三、高麗、朝鮮文學中的騎驢與騎牛意象	22
四、朝鮮繪畫中的騎驢意象	37
五、日本文學與繪畫中的騎驢意象	54
六、中國詩與畫的不同傳統	71
七、中國詩畫傳統在朝鮮、日本的變遷	85
八、結語	92

漢文學史上的 1764 年	95
---------------------	----

一、引言	95
二、甲申行唱酬筆談之特徵	99
三、甲申行在朝鮮文壇之反響	118
四、甲申行唱酬筆談之文學史意義	133
五、結語	147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	149
一、引言	149
二、許筠首倡倡導實踐之樣板	154
三、明末清初文學選本之刺激	159
四、朝鮮女性文學意識之自覺	170
五、朝鮮女性文學成就之影響	175
六、結語	184
論唐代的詩學暢銷書	186
一、引言	186
二、唐代的詩學暢銷書	186
三、佛門對暢銷書的貢獻	199
“賓貢”小考	207
一、問題的提出	207
二、“賓貢”釋義	210
三、唐代“賓貢”考	215
四、“賓貢”考試與放榜	226
李鈺《百家詩話抄》小考	236
一、作者考	236
二、內容考	239
三、文風考	243
廓門貫徹《注石門文字禪》譚論	251
一、廓門貫徹的生平與交游	251
二、《注石門文字禪》的學術淵源及產生背景	255

三、《注石門文字禪》的特色·····	270
從朝鮮書目看漢籍交流 ·····	294
一、王室書目 ·····	295
二、地方書目 ·····	302
三、私家書目 ·····	307
四、史志書目 ·····	320
五、現代書目 ·····	325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解題 ·····	336
一、《林碧堂遺集》·····	337
二、《德峰集》·····	340
三、《玉峰集》·····	342
四、《蘭雪軒集》·····	347
五、《景蘭集》·····	353
六、《梅窗集》·····	354
七、《光州金氏逸稿》·····	357
八、《琴仙詩》·····	358
九、《貞夫人安東張氏實記》·····	359
十、《安東世稿》(附《聯珠錄》) ·····	361
十一、《宇珍》·····	366
十二、《浩然齋集》·····	367
十三、《允摯堂遺稿》·····	370
十四、《山曉閣芙蓉詩選》·····	373
十五、《令壽閣稿》·····	375
十六、《情靜堂遺稿》·····	377
十七、《杏堂殤姊冤稿》·····	379

十八、《三宜堂稿》·····	380
十九、《靜一堂遺稿》·····	382
二十、《幽閑集》·····	386
二十一、《宜言室卷》·····	387
二十二、《雲楚堂詩集》·····	388
二十三、《湖東西洛記》·····	392
二十四、《竹西詩集》·····	394
二十五、《貞一軒詩集》·····	396
二十六、《只在堂稿》·····	398
二十七、《藍田詩稿》(附《小藍詩》) ·····	400
二十八、《清閑堂散稿》·····	402
二十九、《松雪堂集》·····	403
三十、《小坡女士詩集》·····	405
三十一、《姑婦奇譚》·····	407
三十二、《鳳仙花》·····	409
三十三、《御製內訓》·····	411
三十四、《胎教新記》·····	414
三十五、《李朝香奩詩》·····	416
三十六、《東洋歷代女史詩選》·····	417
三十七、《洌上閨藻》·····	418

附錄：

“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

——張伯偉教授談域外漢籍研究 ·····	徐雁平 421
一、何謂域外漢籍 ·····	422
二、作為新學問的域外漢籍研究 ·····	424
三、域外漢籍研究的意義 ·····	426

四、治學範圍的拓展與域外漢籍研究所的計畫	428
後記	433

導言：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

每一時代的學術，皆有其自身所面對的問題和所處的困境。為了解決問題，走出困境，就需要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提出新的理念、材料和方法。各門不同學科所面對的，往往是一些具體的問題；而由各種具體問題歸結起來的共同點，就構成了一個時代的問題，正如禪宗所說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①。中國學術之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始於二十世紀初。如果學術之升降以百年而論的話^②，對於身處二十一世紀初的關心學術前途、承擔學術命運的學者來講，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思考起點。

中國的現代學術，是在西方學術觀念和方法的衝擊和啟示下形成的。而在世界範圍內的自十九世紀以來的漢學研究，儘管有從漢學(Sinology)到中國學(China Studies)的轉變，但說到底，也都是西方學術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當我們回顧百年來的中國學術，除去文獻、人物和史實的考辨以外，其學術方法、理論框架以及提問方式，佔據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說是“外來的”。應當看到，在外來的理論、觀念和方法的啟示下，中國學術曾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甚至仍然可能繼續產生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胡適當年強調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而所謂“科學的方法”，其實就是西洋人做學問

① 玄覺《永嘉證道歌》，《大藏經》第48冊，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1957年版，頁396。

② 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云：“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錢大昕全集》第七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頁1。

的方法。傅斯年 1928 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①他所想“借”的“幾個不陳的工具”，說穿了也是西洋的方法。陳寅恪在 1934 年寫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曾經以王氏為例，舉出其學術“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的三項原因，前兩項都屬於材料方面（地上和地下，異族與漢族），列於第三的就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②。然而不幸的是，此後汗牛充棟的論著，其絕大部分早已不是甚麼“參證”，外來的觀念和方法愈演愈烈為學術研究的起點（提問方式）和終點（最後結論）。上世紀八十年代，當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嚴耕望前往任教之時，錢穆的反應是：“應該講講，給青年們一些影響，否則他們都不懂學問究該如何做了。”^③撇開個人的學術恩怨和偏見不談，這也代表了本土學人對於二十世紀學術方法的一種看法和意見。中國的改革開放三十年，正在使自身由發展中國家向現代化國家轉型，在經濟上，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但這種有別於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引起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學者的注意和承認。那麼，在學術上，中國的讀書人能否提出並實踐一種有別於西方的知識生產方式呢？這，就是我所體認到的當代中國學術所面臨的問題和所處的困境。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以“西方中心觀”為主的中國研究，已經開始受到一些富有反省力的學者的質疑和挑戰。在這裏，我想舉

①《傅斯年全集》第 4 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版，頁 258。

②《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頁 219。

③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版，頁 113。

出兩部著作為例：一是美國學者保羅·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①，另外是日本學者溝口雄三(Mizoguchi Yuzo)的《作為方法的中國》^②。兩部著作的共同點就是對學術研究(主要是中國歷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觀的挑戰，強調以中國歷史的內部為出發點，用中國的觀念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即所謂“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雖然這兩部很有影響力的著作都已經被翻譯成中文，但就作者而言，他們寫作的動機和預設的讀者，本來主要是西方(更多是美國)和日本的中國學家，他們是從自身學術系統的反省中提煉出這樣的理論主張。因此，即便在上述兩書中，其針對的問題和解決的策略也是不盡相同的。所以，中國學術界有必要對此作進一步的思考。

由於溝口先生是一個亞洲的知識人，因此，對於中國的知識人來說，他的思考是更富於啟示的。誠如他指出：“迄今為止，特別是近代以來，以歐洲的視角來看待中國乃至亞洲，已是很一般的事。”^③而對於日本漢學來說，由於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內化為日本式，所以，自江戶以來的中國研究更多的“來自他們對日本文化的興趣或日本的文化傳統”^④，這就是“沒有中國的中國學”。因此，他提出了“以中國為方法”，其目的是“想從中國的內部，結合中國實際來考察中國，並且想要發現一個和歐洲原理相對應的中國原

①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 年版。

② 《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李甦平等譯，更題為《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

③ 同上書，頁 17。

④ 《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頁 91。

理”^①，“以中國為方法，就是要追求那種對原理的、同時也是對世界的創造”^②，這種富有熱情的責任同時也是富有責任的熱情是十分令人欽佩的。從陳寅恪 1929 年所寫的“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③，到六十年後“中國中心觀”的提出，這是一個由外向內的重重大轉變，但中國學術界是否就可以因此而甘之如飴、全盤接受呢？其實，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中心”實在是一個由來尚矣的觀念，並且曾經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史記》、《漢書》開始，中國的史學觀就是以自我為中心，也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儘管在十六世紀以來的西方文獻中，常常提及中國人有這樣的自負：“唯有他們自己才有兩隻眼睛，佛朗機（法蘭克）人（即歐洲人）只有一隻眼睛，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是盲人。”^④兩隻眼睛的本來意義，是應該既看到自己，也看到他人的。但在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圖像中，兩隻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自己，就是自己在他者身上的投影。這與用一隻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列強憑藉著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國門，使得中國人在血和淚的淘洗中擦亮了第二隻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漸漸認識了自己。因此，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術研究，不能也不可能回到以自我為老大式的“中國中心觀”。我們不僅要用一隻眼來看自己，不僅要用第二隻眼去看別人，我們還要擁有第三隻眼，這就是用外國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異域之眼”。

因此，我想在這裏提出一個命題——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用以概括十多年來我在學術上的一個努力方向，也試圖對當代學術所

①《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頁 94。

②同上書，頁 96。

③《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陳寅恪詩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頁 18。

④赫德遜《歐洲與中國》，王遵仲等譯，中華書局，1995 年版，頁 1。

面臨的問題和困境作一個初步的回應。

什麼是漢文化圈？關於這個問題，前人已經有了不少論述，這裏姑且借用日本學者西嶋定生(Nishijima Sadao)的說法。他指出：“‘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明的發生及發展為基軸而形成的。……隨著中國文明的開發，其影響進而到達周邊諸民族，在那裏形成以中國文明為中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這就是‘東亞世界’。……這樣的‘東亞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包括其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與西藏高原中間的河西走廊地區東部諸地域。……構成這個歷史的文化圈，即‘東亞世界’的諸要素，大略可歸納為一、漢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項。……其變化乃至獨自性，是與中國文明相關聯而呈現出來的現象。因而共通性並非抹殺民族特質，相反是民族性的特質以中國文明為媒體從而具備了共通性。”^①西嶋氏所說的“東亞世界”，大致即本文所指的漢文化圈。作為其本質的特徵，列為第一的就是“漢字文化”。而在法國學者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看來，“這一區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於中國而通用於四鄰的漢字。所謂漢文化圈，實際就是漢字的區域。漢文化圈的同一即‘漢字’（符號 *signes*）的同一”^②。由漢字所構成的漢籍就是漢文化圈的載體。麗末鮮初的權近在《送日本釋大有還國》中云：“情懷每向詩篇寫，言語須憑象譯通。”^③日本江戶時代石川貞《呈朝鮮國副使書記元玄川》云：“不愁相值方言異，清興熟時揮彩毫。”^④而越南黎朝使臣馮克寬在《答朝鮮國使李

①《東亞世界的形成》，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2卷，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88—92。

②《新漢文化圈》，陳彥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頁1。

③《陽村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7冊，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頁28。

④《星槎餘響》卷上，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睟光》中云：“彼此雖殊山海域，淵源同一聖賢書。”^①阮公沆則在《簡朝鮮國使俞集一、李世瑾》中云：“威儀共秉周家禮，學問同尊孔氏書。”^②以漢字為基礎，從漢代開始逐步形成了漢文化圈，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在同一個文化精神的熏陶下，表現出驚人的內聚力。

什麼是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漢文化圈的形成，其核心是東亞文明。儘管在漢文化圈中有著不同的國家及民族，但人們內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觀念、知識結構等，往往是根據某些基本原則而展開。作為其基本載體，就是今天在中國、朝鮮—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地所大量存在的漢籍，站在中國的立場，我們把中國以外所存在的漢籍稱作“域外漢籍”。將漢字材料作為一個整體，就是以漢文化圈為方法的文獻基礎。也就是說，當我們提出“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我們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文獻，就是超越了國別和地區的漢籍整體。這就要求研究者以更為弘通的眼光、更為寬廣的胸懷、更為謙遜的態度來對待各類漢文獻。對於中國以外的漢文獻的認識由來已久，杜佑《通典·邊防典·東夷上》指出：“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③朱權《原始秘書》也指出：“高麗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安南之學始於漢立郡縣。”^④但在二十世紀之前，中國人提及域外漢籍，僅僅是從證明自身“文教之盛”的角度去看待，未能擺脫“禮失而求諸野”的思想牢籠，未能消釋“慕華”、“事大”的心理優越，未能超越“中心—四裔”的二元化區隔。1934年，陳寅恪在總結王國維的學術成就時舉出了三點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取異族之故

① 裴壁編《皇越詩選》卷五，希文堂刊本，越南河內漢喃研究院藏。

② 同上注。

③ 中華書局校點本，第5冊，1988年版，頁4985。

④ 朴趾源《熱河日記·銅蘭涉筆》引，《燕巖集》卷十五，《韓國文集叢刊》第252冊，頁324。